

经济增长的历史观： 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差异

姬 超

内容提要 国民财富增加和国家繁荣是每个民族国家竭尽全力所要实现的目标,现实却是有的国家极其富裕,有的国家极端贫穷。在理论解释上,无论是立足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还是依托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赶超理论,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既忽略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发展伊始所具有的不同资源禀赋特征,又割裂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客观存在的市场联系。从历史演进的视野,重新审视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化发展事实,结果表明:(1)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阶段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发展和转型过程;(2)在具体的发展场景中,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都可能导致结果的极大不同;(3)初始的资源禀赋之外,不同的发展环境也产生了不同的制度需求和供给,资源-环境-制度的实际作用方式也导致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各种发展要素的作用机制也存在巨大的差别;(4)发展不只是经济的短暂增长,更是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内在协调与统一。因此,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因地、因时制宜,根据特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国内外环境提供的特殊机遇,选择相应的发展方式,渐进地实现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深刻转型。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也要充分重视发展阶段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着力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更高需求与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实现需求与供给、经济与社会、政治在更高层次的均衡发展。

关键词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发展环境 资源禀赋 发展路径

姬 超,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博士后,香江学者 999077

工业革命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后发地区追赶先行地区的步伐从未停止,成功者有之,失败者更多。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发生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历史场景中,并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的、完美的发展方式,发展更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无法预设一个较为发达的经济体或理想的发展方式作为后发地区的赶超目标。此外,随着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在发生变化。因此,不同国家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与政府扩张的内在机理研究”(15CJL013)阶段性成果。

和地区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国内外环境,选择现实可行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而言,近四十年来的发展尤为显著,当下的中国已非单纯从外界学习发展经验,而是在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民族智慧,进一步彰显了发展模式的适应性变迁对于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但是,也不能假定发展中国家存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立足于发达国家经验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是依托发展中国家经验提出的赶超理论,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它们既忽略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化资源禀赋特征,又割裂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阶段客观存在的市场联系。鉴于此,本文重新审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异化的发展事实,意在强调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在不同阶段所适用的发展方式也是不同的,这是本文在理论方面的边际贡献所在。基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经验比较,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矛盾转化的事实,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一、世界经济整体过程和阶段性差异

1. 世界经济整体图景

从长远历史角度观察经济现象,可以使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在过去上千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始终处于贫困状态,各国经济基本上都以农业为主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长期落后于人口增长。马尔萨斯认为随着人口数量地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伴随着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在既有的技术条件逐渐无法承载人类消费需求的前提下,人口扩张与资源约束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日益明显,最终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经济就此会陷入一个低水平的恶性循环^[1]。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19世纪以前相当长时期内全球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是极其缓慢的。麦迪森的估计表明,在公元1000年以前的一千年当中,世界人均收入一直在450\$(1990年国际元,下同)左右徘徊,增长率几乎为零。在公元1000—1820年之间,世界人均收入的年均水平一直低于670\$,平均增长率仅为0.05%^[2]。与此同时,世界人口也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口增长推动,最终又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但是对于这种依靠人口增长推动的“增长”,许多学者并不承认。诺斯指出,增长必须是:

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均消费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经济停滞意味着人均收入非持续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相当长的时间周期中可能表现为有升有降。^[3]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才真正得以启动,国内生产总值和年均增长率大幅提高至2%左右,并且持续了近两百年,长期的经济增长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人类终于走出了马尔萨斯式的增长循环。但是,世界经济整体欣欣向荣的背后是不同国家的结构性差异,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同步发生。早期的经济发展主要发生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图景中,既有先行者,也有后行的追赶者,在此过程中,不乏有成功超越者,但更多的是追赶失败者,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国家和地区长期停留在不增长或负增长阶段,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

[1]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王惠惠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10页。

[2]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3]道格拉斯·C.诺斯,罗伯特·P.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 世界经济增长的三个阶段

综合考察世界各国的增长经验,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过程通常类似于一个S形曲线^[1],这种增长包括了以下三个阶段:缓慢增长、快速增长和低速增长^[2]。每一个富裕国家都是通过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转型逐渐实现的,当前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相应对应于某一特定阶段。

在第一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慢,年均增长率低于4%,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与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越来越大。而且,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型并不容易,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地上升到第二阶段,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徘徊在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改善,政府治理能力极差,腐败问题严重;在第二阶段,成功跨越第一阶段来到这一区间的国家,通常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很强的资本积累能力,它们不断强化投资和引进更为先进的技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长期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通常在5%以上,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缩小;相比之下,能够成功转型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国家数量就更少了。许多国家即使进入到了快速增长的第二阶段,由于不能维持足够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迟迟无法跨越到更高地发展阶段,甚至可能滑落到第一阶段。当然,一旦进入到第三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也会迅速下降,更高的年均增长率对于这些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战后在世界众多经济体中,能够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并且成功跨入高收入群体的只有两个: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固然是奇迹,但各省、地区之间的增长并非同步,仍有一部分地区处于相对贫困和落后状态。巴罗和萨拉·伊·马丁严格的计量检验也显示,各个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收敛趋势^{[3][4]}。

3. 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启示

一个经济体S形线的增长轨迹描述了经济增长的真实路径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与其探索经济如何增长,不如探索经济为什么不增长,以及经济短暂的低速增长甚至停滞所可能带来的对经济转型的积极意义。转型问题并非只在落后国家和地区才会出现,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样需要根据发展阶段以及环境变化不断寻求转型,转型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优于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这也正是转型的目标。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第一,是什么因素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迅速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发展中国家又能否独立的获得增长要素?第二,支撑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又是什么?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很少有国家能够同时具备各种增长要素,获取增长动力同样需要花费成本,从而导致了多

[1]Hui Ying Sng,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itio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Lim's S-curve Hypothesi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Pte.Ltd, 2010, p.16.

[2]与此类似的,“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的“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将经济发展阶段也划分为三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在3000美元和9000美元之间)、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参见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6-2017第38页。

[3]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在观察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种收敛类型:条件收敛和无条件收敛。无条件收敛是指无论如何,穷国都将获得比富国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收敛于富国的经济表现;条件收敛假设富国和穷国仅仅在资本-劳动比和人均产出上存在差别,其它方面包括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等都是一样的,最终富国和穷国将达到同一个稳定状态。由于增长相关的许多其它重要变量不能被控制,条件收敛很难得到验证,威廉·鲍莫尔(Baumol,1986)的分析显示穷国和富国之间也不存在绝对收敛趋势,但巴罗等人提出的这一点却成为增长理论复兴中最激动人心的表现,并且成为思考经济增长难以绕开的经典问题。Barro, Robert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p.482.

[4]Barro, Robert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p.482.

样化的增长形态。对于这一点显然具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现有理论也没有就不同增长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给出合理的解释,有理由充分相信,不同的要素组合形式决定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其成本是不同的,能够获得的收益也是不同的。这些相互影响的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然不同经济体在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增长方式,那么就并不存在某个绝对理想的增长方式提供给后发地区进行直接复制或简单模仿。不同地区在不同阶段的增长方式究竟存在哪些不同,各自又存在哪些问题,这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

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及其成功经验

1. 发达国家如何实现最初的经济起飞

发达国家主要指的是增长初期就采用了英美宪政体制的欧美国家,也即“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映照下的发达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当前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刻画的正是发达国家的成长故事。1750年左右,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使人类近代史上首次出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随后,现代经济增长迅速向欧洲大陆其它国家扩展,进一步又扩展到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新大陆国家。当然,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并不完全相同,相比英国而言,德国、美国等‘后发’国家的成长具有各自独特的特征,但是相比亚洲、非洲多数经济体而言,本文仍然倾向于认为这些国家可以统一归为发达国家。

工业革命之前,人均收入在千百年来几乎维持不变,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极为有限,成长的主要特征只能表现为人口规模的扩张,庞大的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科技、文化、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发达程度。当然,这种成长无法摆脱马尔萨斯式的低水平循环,因而是一种内卷式的成长,以现在的标准衡量,这种成长显得微不足道。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欧洲面临的传统资源约束得到改善,资源禀赋状况发生了极大变化,成长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依然缓慢。新大陆的发现令英国等国家得以从新大陆进口土地密集型 and 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包括粮食、棉麻、燃料等生产资料,同时将本国的纺织品大量输出。在此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得以从土地束缚中逐渐释放出来,为英国工业革命在全社会的全面展开创造了条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不断发生,促使欧洲走上了劳动节约型、资源密集型的成长道路。与此相反,亚洲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亚洲在当时只能沿着节约土地和吸纳劳动的农业发展道路继续缓慢前行,历史大分流就此形成,西欧国家开始将中国等东亚国家远远的抛在了身后^[1]。

2.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要素作用机制

当人们提到成长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点在根本上依赖于人均产出的提高,也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还有资本的不断积累以及更多与更先进的机器设备的应用。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共同推动着经济增长,决定要素组合方式的是特定的技术条件。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不同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可能。例如,大量富余的剩余劳动力可以部分替代稀缺的机器,先进的技术设备也可以部分替代人力劳动。在劳动力稀缺的美国,道路建设通常会使用较多的手提钻和较少的工人,但在劳动力富裕的印度和中国,则会使用大量的工人和镐头来凿石头。另外一个更具影响力的例子莫过于‘福特模式’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每个工人站在机器旁边不动,通过传送带将产品送到工人手中,而不是让工人走到产品旁边,这种技术创新同样节省了稀缺的劳动力资源。

对于一个刚刚经历经济起步的国家而言,增加投资、提高机器设备的利用率将能够促进经济增

[1]郭金兴:《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资源暴利: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解释与启示》,〔武汉〕《经济评论》2009年第2期。

长,但在劳动等其它要素固定不变的条件下,随着资本存量的逐渐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不过在欧美国家,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发挥作用的时间被大大延迟了,经济增长得以继续下去,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改变了这一走向,资本积累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资本回报率转而提高,更多的资本积累得到实现。从长期来看,人均资本、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和人均产出都会(以相同的速度)不断增长。进一步地,技术进步的来源又是什么?显然,沿着技术进步的脉络将展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整体增长路径。

3.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

在了解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整体过程之后,其中一个细节仍然有待说明,即技术进步的方向,这一点决定了不同地区具体的增长路径,尽管这些路径最后都将导向共同的一点: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核心的经济持续增长。那么,决定技术选择路径的因素又是什么?答案是资源禀赋的变化,欧美国家工业革命启动的经历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资源禀赋是在长期决定要素价格的根本因素,资源禀赋变化相应地产生了对新的生产方式的需求,也即技术进步的方向。

由于各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同,在实际的增长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增长路径也经常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技术进步的实际过程中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的偏向性,根据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技术进步表现出节约某种稀缺要素的倾向,即以丰裕要素代替稀缺要素,以更好地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在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和行业领域,技术进步同样表现出特定的偏向性。最终,技术体系的协同演化进一步强化了一个国家的增长路径,使得经济转型无法轻易实现,通常只能在既有路径上发生渐进式的演化。

总体而言,欧美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1%~2%,但这种增长却持续了一到两个世纪,与其它国家的收入差距也越拉越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导致发达国家增长如此缓慢却又如此持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4. 发达国家增长速度缓慢而持久的原因

欧美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普遍较为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一套完善并且可信的产权体系和市场交易规则对于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必不可少。但是这一制度体系的形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是一个逐渐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作为先行者的发达国家并无现成的制度规则可供直接模仿,只能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不断试错,通过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博弈,最终才有可能形成一套全社会都认可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像英国这样的先行者而言,一套全新的适应性制度体系的建立只能依靠自身文化的反思,推动传统意识形态和道德准则的演变,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规则最终才得以孕育,这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事实上,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是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宪政体制,工业革命才得以发生。由于思想意识和文化认知模式的改变要比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缓慢得多,导致先行地区的经济增长不能实现迅速的跃升,只能通过缓慢的积累实现动态的循环累积^[1]。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无论在适应性还是在稳

[1]据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从工业革命开始,英国人均GDP翻一番花费了超过150年的时间,从1300美元增长到了2600美元。而120年后的美国,实现同样的倍增所花费的时间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约为53年)。而中国从1300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涨至2600美元的水平,仅仅用了12年,不到英国的十分之一。而且,类似的趋势仍然在延续,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均GDP增速预测,中国仅需7年就能将人均GDP从目前的8400美元翻倍(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从而跨入高等收入国家,其它较为发达的经济体要想实现人均GDP翻倍,所需花费的时间明显要更长。参见凤凰财经:《内地人均GDP7年后将翻番》, <http://finance.ifeng.com/news/hqcj/20111208/5236899.shtml>。

定性方面都要比发展中国家稳健很多,因而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方面也更为彻底。这也正是许多学者在追溯增长本源时,基于西方语境而逐渐将焦点转向信仰体系和文化认知模式的原因^[1]。

当然,在欧美国家内部,不同国家的制度演化路径也存在差异性。对于后发地区而言,他们既可以选择全盘复制英国的制度模式,也可以选择不模仿。例如德国和美国就没有选择完全复制英国的个人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在其基础上逐渐摸索出了管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最终实现了对英国的全面超越。由此可见,后发地区如果能够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包括生态、地理、技术、人口、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实现相应的制度创新,就有可能完成对先行地区的超越。如果只是一味地进行制度模仿,不仅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适应性困境,还可能长期陷入追赶陷阱。

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追赶路径及其失败教训

1. 大赶超战略的失败

在寻求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的道路上,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更加强烈的赶超意愿。二战之后,许多现代民族国家尝试着将国内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由于缺乏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以资源型产业和农业等基础产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导致了生产力水平的长期落后,城、乡和工、农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极大限制了经济增长。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经验的适用性非常有限,无异于快速的经济赶超,客观上促成了欠发达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长时另起炉灶,带来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分道扬镳。于是,许多欠发达国家开始依托政府的力量来引导本国产业结构的转型。

在追求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收敛甚至全面转型的过程当中,各种赶超战略大都强调通过国家力量,全面模仿或复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以此实现经济体系的迅速转变。结果大多差强人意,或者是短暂的增长,或者是更加严重的衰退和危机。在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尝试了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经济转型,但结果却非常糟糕,一些国家(例如前苏联国家)的现状甚至还不如转型之前。事实证明,仅仅通过复制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修正结构主义思潮下扭曲的价格体系,这种转型路径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复制西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

在后发地区追赶先行地区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资本短缺和劳动力过剩的矛盾,许多学者认为后发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本积累,例如,刘易斯认为经济增长与投资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一旦估计出这个比例,就可以计算出达到目标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水平^[2]。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人口问题,投资还必须快于人口增长速度,资本投入在东亚国家的经济赶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

不过结果依然差强人意:接受了西方国家大量援助的撒哈拉非洲地区几乎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拉丁美洲和中东一度出现增长,但在20世纪80和90年代重新陷入了增长乏力的陷阱;南亚的贫困人口与日俱增;一度令人鼓舞的东亚尽管取得了非凡的增长成就,但近年来也纷纷陷入持续增长乏力的泥潭,只有少数国家出现了复苏迹象。可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并不顺利。从长期的增长结果来看,资本的确在增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差

[1]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2]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

异中只有极少部分能够由人均资本的增长率差异来解释,多马甚至推翻了自己关于生产能力和资本存量保持固定比例的理论假设,宣称他们研究的最初目的只是对经济周期发表一些看法,而非解释现实中的经济增长现象^[1]。

如果说资本要素绝非发展中国家实现转型的充分条件,那么如何解释那些看起来比较成功的后发地区,例如日本、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不断资本积累的事实,是什么因素扭转了这些国家资本回报率递减的倾向?先行地区的增长经验表明了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技术进步以及知识、人力资本的积累,然而东亚经济体的增长经验并不支持这一点,技术进步等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2]。相反,在1960—1987年间,非洲一些国家的人力资本增长极为迅速,例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加纳、赞比亚、马达加斯加、苏丹等国家的人力资本增加速度显著高于新加坡、韩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但前者的经济增长速度却又显著低于后者。可见,即使存在显著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但如果不能正确运用它们,这些技术也是没有用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一套适应性的制度来激励技术进步是必要的。

2. 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制度瓶颈

接下来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一旦启动,其追赶速度为何通常总是显著快于发达国家?一个当然的解释是先行者为后发者提供了模仿的机会,避免了其漫长的演化和积累时间。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另外一个重要的起飞条件在于是否成功利用了先行者提供的市场,并且在此基础上转化形成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融入世界市场是发展中国家迅速实现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开放的世界和日益增长的国际联系,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资本的大量流动、知识和科技的快速传播,都为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条件。这种高速增长体现为投资的快速增长甚至局部地区(行业)的过度投资,资本存量迅速提高。但是,在根本上决定增长质量和可持续的不是投资的增长率,而是投资的效率,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就要克服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至少将这一递减过程尽量延迟。根据伍晓鹰的测算,一个经济体从增长初期到基本完成工业化,其资本-产出比大致会从1上升到3左右或更高的水平,也即生产同样一个单位的产出,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3]。对于后发地区而言,在高速追赶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增长的效率,通过不断的技术和制度创新尽量延迟资本-产出比的上升速度。

不过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并非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成功的模仿和追赶,能够完成超越的国家就更少了。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经济增长时,既可以选择单纯复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也可以选择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经验,甚至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良,以更好的适应本国资源禀赋。做出何种选择取决于特定的环境条件,甚至一些偶然性因素也会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前苏联通过模仿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迅速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但落后的政治和法制基础导致这种增长只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甚至损害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南美国家基于优越的资源条件,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经济也实现了大幅增长,但却无法通过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许多国家同样如此,尽管实现了成功的追赶,但要进一步超越欧美发达国家却不断遭遇制度瓶颈,进一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变的非常困难,高速增长很难持续下去,这是许多发展中国

[1]Domar, Evsey D., "Depreciation, Replacement and Growth—and Fluctua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1957, 67(268), pp.655-658.

[2]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刘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3]伍晓鹰:《测算和解读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12-10/100615706.html>.

家在追赶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困境(curse to the late comer)。

四、经济增长失败的原因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本文并非主张简单的历史决定论,而是综合考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将其置于一个开放的国际背景下,考虑在不同阶段经济增长方式的合理性以及现实可行的增长路径。以中国为例,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逐渐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的发展方式必然要相应地进行转换,包括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策略等,都要求进行深刻地反思和适应性调整。这种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一方面,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地缘格局的深度变化,国内外发展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为了进一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要充分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种种错误观念。

1. 经济增长失败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为了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根据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断调整增长方式,但是转型并不容易实现。首先,增长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转型路径被人为割断,导致不能根据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变化相应的调整增长方式;其次,增长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试图超越特定资源禀赋和国际环境,简单复制理想的生长方式。但是历史通常不能飞跃,必须依据当前的资源禀赋条件和国际环境寻求可行的转型路径,逐渐完成经济转型。增长并非没有代价,如果不考虑自身的现实条件盲目推动转型,不但无法实现预期的增长模式,反而可能导致深层次的动荡和失序。许多国家试图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改革迅速实现转型,结果反而比改革之前更加糟糕。最后,短期调整政策掩盖了结构性矛盾,增加了转型难度。当遭遇经济危机时,各国政府头痛医头的应对政策大多是短视的,局限在应付危机本身,却忽略了危机给经济转型带来的机遇,因而是以牺牲长期增长为代价的。短期的调整不仅无法实现彻底的转型,甚至加大了未来转型的难度。无论如何,短期的需求结构归根到底是由长期的生产结构决定的,所以不能总在调整短期经济政策的圈子里打转,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上,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根本仍然在于生产和供给层面^[1]。

2. 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可持续的增长意味着通过转型实现不同阶段的增长方式转换,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从一种增长方式逐渐转变到另一种增长方式,是一个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质量的过程。从国际视野来看,转型则是包含一系列“转变”的集合,包括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推动型转变、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由低级经济结构向高级经济结构转变等等^[2]。总之,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了要素结构、产业结构以及需求结构三个方面,但能够在各个方面都完成转型的经济体并不多,能够在短期完成转型的更是几乎不可能。不同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转型任务是不一样的,合理的转型方向需要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国际环境加以选择,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转型标准。

(1)要素结构。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增长对要素投入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越来越小,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要素投入的贡献。一般地,前

[1]吴敬琏:《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及发展走势》,〔北京〕《小康》2011年第3期。

[2]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课题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国际趋势与启示》,http://www.crpe.cn/06crpe/system/2010/06/18/016694177.shtml.

者被认为是粗放的、资源损耗型增长,因而是不可持续的,而后者被认为是集约的、环境友好型的增长,因而是可持续的。

但是,要素结构的转变必须依据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合理选择。例如,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起飞阶段进行大量投入可能是必要的,这是发展中国家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以取得竞争优势的前提。另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包括很多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余值”的贡献率的方式也包括很多种,它并不简单的意味着减少投入,不同经济体、不同阶段的路径选择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现有文献并没有指出这些国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方式是否相同,但这一点对于寻找更为清晰的转型路径却是非常必要的。

(2)产业结构。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经济转型一般表现为从轻工业为主导转向以重工业为主导,再转向以高技术加工产业为主导,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转向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再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特别的,经济转型还表现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会迅速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则会逐渐提高,吸纳的劳动力数量逐渐增加,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甚至会超过第一、二产业的总和。例如,当前美国第三产业的占比在80%左右,日本第三产业的占比也在70%以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的主导产业从最初的纺织工业逐渐转向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进而转向计算机等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表现为微笑曲线的变化形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增长起点不同,产业发展过程未必严格遵循这一顺序,例如在印度,率先实现突破的是以软件开发为主的信息产业,其未来转型路径自然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总之,产业转型必须兼顾产业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一味追求产业高级化未必能够带来整个经济的良性发展。

(3)需求结构。从需求结构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可持续增长的增长意味着消费的增加,消费应当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同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可持续增长的重点也存在差异。本文认为,可持续的关键首先是实现三驾马车的均衡,避免经济体系过大的波动;其次,由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不同,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是不断变化的,因而需求结构也是不同的。另外,从长期来看,决定经济增长的是供给结构而非需求结构,需求结构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结果或者增长的表现形式,这一点也决定了本文的分析角度主要是从供给或生产的角度进行的。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尽管我国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仍然非常必要,但本文并不赞同盲目地减少投资数量。对于任何国家的长期增长而言,投资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应注意投资在区域之间的差异,区域之间的资本再配置可能比简单地减少投资更为可取。以美国为例,长期过度消费的增长模式如今也不得不面临转型和再平衡的境遇,出口方面的情况与此类似。因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或调整应当因地制宜。

3.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无论是从要素结构、产业结构,还是从需求结构论述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其本质都在于供给和需求的再平衡。随着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的改变、要素禀赋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都必须保持相互匹配。基于此,我们把焦点从理论转换至中国实践,中共十九大报告业已鲜明指出中国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从2020年到2035年,中国人民要继续奋斗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继续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现代化建设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体系。为了实现这一阶段性目标,既

有的增长方式必然也要发生适应性的变化。

当前,在逆全球化或者说后全球化时代,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抬头,全球化进程开始遇阻,全球分工体系和治理秩序也面临新的变化。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基础的中国各地必须因应形势,整合区域力量,以新的姿态更好地推进全球化,重塑发展理念与增长方式。“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是中国主动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寻求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当然,在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中,中国各地面临着特定的发展难题,因而调整的重点也有所不同,能够率先创新突破制度瓶颈、转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地区必将获得新一轮的竞争优势。

五、结论与启示

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增长方式,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后发地区的经济扩张道路将遵循先进的工业化地区的历史轨迹,尽管本文并不否认“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欠发达的国家展示了后者未来的图景”这一点的广义有效性^[1],但这一点并不绝对。事实上,发展中国家面临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环境,恰恰因为其落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可能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与发达国家根本不同的倾向^[2]。

更为重要的是,任何经济体的扩张都发生在真实的历史情境当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属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借鉴与学习的经验发达国家将构成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扩张的重要前提。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过程也将呈现与发达国家非常不同的特征,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增长速度上,而且还体现在增长过程中产生的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技术体系中,还也体现在经济扩张过程中直接模仿或借鉴的各种制度性手段上,而以上这些工具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3]。

那么发展中国家完全没有必要重新尝试发达国家旧的增长道路,政府一方面可以尽快扫除增长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依据自身资源禀赋制定相应的增长战略;另一方面可以积极引导鼓励从发达国家引进吸收新的技术,迅速实现经济起飞。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增长的特征,同时也为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埋下了隐患。可持续的增长能够根据资源禀赋和环境变化自发调整增长方式,以获得持续的高效增长。为了实现发展方式的顺利转换,经济转型过程中还要注意避免失序格局,以有效应对转型带来的社会动荡。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不应该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更是一个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增长,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相互协调的增长。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中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范围相应扩大,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大幅增强。在更高层次的开放格局下,传统的发展策略必须相应地进行调整。对于中国各个地方而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

[1]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页。

[2]格申克龙(Gerschenkron,2012)曾指出,并不存在一种统一不变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从这个角度来看,先前的一些学者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原型所做出的一般理论概括(包括有关工业化发展前提的所谓原始资本积累的概念)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而罗斯托关于经济发展一律的遵循类似于五音阶的五个阶段(其实包括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模式也是难以成立的。我们不能根据不同地区的落后程度依次排列,并认为这些地区将依次通过一条共同的道路,最终到达一个完全的终点,历史和现实的多样性也已不止一次的印证了这一点。

[3]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7页。

于深化改革更是形成了难得的倒逼机制。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调整发展策略势在必行。对于中国东部沿海大部分城市而言,更为妥善的发展策略并不是单纯的加大技术与开发力度,有限的资源更应该用于提高企业治理水平、教育、人力资本、生产和生活环境和医疗等“软”制度建设方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应同步开展,以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提高当地经济运行效率,实现更为均衡的发展格局。对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也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在提高当地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实施技术创新活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未来的国内外背景下,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群体更要主动展开竞争,倡导企业主动走出国门,在高水平市场与其它国际企业展开竞争,只有依靠激烈的、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才能真正实现内生性技术进步和内涵式发展。

[责任编辑:如 新]

A Historical View of Economic Growth: Differences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Ji Chao

Abstract: National wealth and prosperity is the goal that every country will try its best to achieve,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some countries are extremely rich whereas some countries are extremely poor. There are inherent defects in theory, whether it is the mainstream economic growth theor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or it is the forging ahead theory put forwar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not only neglecting different resource endowment in early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but also breaking market connection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ifferent stages. The present study re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economy exists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experienced different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2) in specific development scenarios, small differences in initial conditions can lead to a great different result; (3) beyond the initial resource endowment, different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generate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upplies and demands, and the actual roles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ystem also lea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paths and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various elements for development; (4) after all, development is not temporary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internal coordination and unity of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Therefo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st call for choosing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al mode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resource endowment and special opportunities home and abroad. For China, great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hanges of development phases and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supplies and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by deepening the supply-side reform to achieve a higher-level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demand and supply, and economy, society and politics.

Keywords: developed countries;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resource endowment; developmental path